

土地革命战争

纪事

1927—1937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

蒋凤波 徐占权编写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

蒋凤波 徐占全编写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静一胶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5印张 532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数1——6 000

ISBN 7-5065-0723-4/K·66

定价：6.50元

目 录

一九二七年·····	(1)
一九二八年·····	(38)
一九二九年·····	(84)
一九三〇年·····	(125)
一九三一年·····	(177)
一九三二年·····	(237)
一九三三年·····	(299)
一九三四年·····	(373)
一九三五年·····	(433)
一九三六年·····	(524)
一九三七年·····	(616)

一九二七年

七 月

上旬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亦称五人中央常务委员会或五人中央政治局兼常务委员会），代行政治局职权。从此，陈独秀不再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

13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公开揭露谴责国民党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后日趋反动的种种罪行，声明中国共产党“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宣言》还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将高举“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光荣的旗帜”，继续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对一切封建余孽，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 因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革命形势逆转，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于6月30日离开武汉经郑州转西安赴苏联。是日发表《辞职宣言》，说：“此次革命势将重蹈民国元年失败之覆辙。此殊与予素愿相违，故不得不辞职让贤”。

1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苏联《真理报》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决定》。指出武汉国民政府解除工人武装，阻挠土地革命，反对共产党人，它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已变成反革命的力量了。因此，“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刻不容缓地公开宣布退出

武汉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决定》批评了过去中共中央的工作，指出他们“曾犯了一连串的重大的政治错误”，要中国共产党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展开和领导土地革命，同时要“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

△ 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召开“分共会议”。会上，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所派代表陈友仁的极力反对，悍然议决“分共”。

△ 宋庆龄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8日在汉口公开发表），斥责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的行径。声明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据此，宋庆龄在声明中断然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 冯玉祥、徐谦、孔祥熙等致电南京、武汉国民政府，力陈内讧妨害对外，主张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共图和平。18日，胡汉民等自宁复电赞成与武汉方面携手反共。24日，汪精卫等也复电赞同，表示愿迁都南京实行宁、汉合一。

15日 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分共”，公开背叛革命。会上，汪精卫作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的报告，他以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为借口，大肆攻击共产国际和共产党，诬称中共破坏了“容共政策”，要共产党“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会议还通过了“分共决议案”和《统一本党政策案》等决议案。会后，汪精卫集团即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

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进行疯狂捕杀。同时封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等所有革命团体。使中国革命力量自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再次遭到严重损失。至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为标志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后破裂。

△ 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将所属部队统编为七个方面军团。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分别被任命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方面军团长。继以张宗昌、孙传芳部从鲁南开始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军展开反攻，至8月中旬，南京政府军全部撤至长江以南防守。

△ 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鉴于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公开背叛革命，先后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彭湃、聂荣臻等负责干部前往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能够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并联合武汉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支援当地农民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

18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被迫停刊。该报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后曾迁往广州、武汉等地出版。辟有时事评论、寸铁、什么话、肉麻世界、外患日志等专栏。该报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工农运动的发展，以及反映和指导大革命时期的各项斗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共出二百零一期。

19日 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所属各军取缔共产党。要各军长官务须在最短期间，查明所部负责军事及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劝其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停止职务；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如有违反者，立予惩办。

20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通告具体分析了中国农民的政治经济情况，对土地革命阶段南方（湘鄂赣粤等省）和北方（直鲁晋豫等省）农民运

动的策略作了原则规定，并着重阐述了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的关系，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十二分注意农民武装问题，提出了五条获取革命武装的办法。通告还特别指出，每一省的农民运动要把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占重要地位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万不可只求扩大而忘记了中心基础工作。

△ 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谈话会”（亦称第一次九江会议），根据张发奎与汪精卫紧急勾结，并计划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清党”等情况，议定放弃中共中央原定联张回粤的计划，“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遂由李立三等将此意见征得在庐山的瞿秋白同意，并请瞿秋白转报中共中央决定。

中旬 武汉国民政府“东征讨蒋军”之江左军张发奎部（江右军为唐生智第一方面军），以皖南、浙江为进攻目标，沿长江南岸东进由鄂入赣，届时陆续到达九江地区。

22日 蒋介石为防堵武汉政府东征军的进攻，抽调津浦路“北伐”军队五万人西迫湖口、九江，以周凤岐、郑绍虔各军集中浙江衢州，威胁南昌。

2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的新代表罗明纳兹及其助手纽曼到达武汉。

罗明纳兹，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人，1917年3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4月，作为少共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领导机构。

纽曼，1902年生于柏林，德共党员，1924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5年任德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24日 中共中央发出《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向全党通报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公开背叛革命的经过，并依据当时形势提出九条斗争策略，其主要点有：1.要公开揭露武汉政府的反动行

为和汪精卫政变三大政策曲解三民主义的罪恶；2. 中国共产党已退出武汉政府，但仍“留在国民党内工作”，以“团结下层左派分子在国民党内组织在野反对派，反对中央的反动政策”；3. 积极领导两湖的工人、农民争取工农会的自由，以至进行总罢工和抗税斗争；4. 利用秋收时节，积极领导减租抗租运动，以鼓励农民起来向土豪劣绅进攻，夺取乡村政权。

△ 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在九江举行第二次“谈话会”，进一步讨论南昌暴动事。议定：“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并急电中共中央批准。

△ 汪精卫密谋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令其所部集中德安，以三个军的兵力予以围歼。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知后，及时通过叶挺将此事通知贺龙、廖乾吾、高语罕。并于是日，在九江甘棠湖一只小船上举行会议，决定贺、叶不上庐山，部队不向德安集结，而按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军的顺序迅速开往南昌。

25日 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根据派赴九江的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人的建议，决定集中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单独打到广东去。并决定组织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这次起义。周恩来随即经九江赶赴南昌。

26日 叶挺、贺龙所部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之线向南昌集中。翌日抵达南昌。

△ 苏联《真理报》发表题为《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社论。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革命作用已成为过去，阶级矛盾在国民党内部也已表面化。因此，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首要任务应当是“依靠国民党中的工农分子，依靠国民党的基本群众，去反对明显暴露其资产阶级面目的领导人”，“还可以把以

邓演达、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为首的真正左派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同他们一道前进”。社论认为，不管争取国民党的工作结局如何，“国民党内业已出现的重大危机已将建立苏维埃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之上。共产党应当毫不迟疑地着手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一旦争取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能立即号召群众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把它作为劳动群众的机关来同资产阶级的组织相抗衡。”

△ 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在武汉举行会议，再议南昌起义事。会上国际代表传达共产国际电报：“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会议决定由张国焘即赴南昌向前敌委员会传达。然张国焘歪曲电报原意，企图阻止起义进行。

27日 周恩来到达南昌，即日组成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并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前委扩大会，决定7月30日晚举行起义。

△ 前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武汉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离武汉，取道郑州、陕西，经蒙古回苏联。

28日 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时事问题简评》，指出：“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其程度说来，可能类似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遭到的失败。”“在高潮没有到来以前，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当在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

29日 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等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进一步策划“清共”。决定：（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在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

△ 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分在九江给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连发两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候他到再决定是

否举行起义。

30日 晨，张国焘赶到南昌，以起义没有成功把握和必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为由阻挠起义，遭到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人激烈反对，但因张系中央代表，“不能以多数决定”，争论至深夜未决，原定30日起义的计划被迫推迟。

31日 晨，南昌起义前委继续举行会议，经数小时争论，张国焘最后表示服从多数，会议决定8月1日晨4时开始起义。后因起义时间泄漏，前委又临时决定提前两小时行动。

本月 中共中央提出《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内分“反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工人”、“农民”、“军人”、“教育”、“妇女”等八项，原则规定了国民革命的基本任务。

△ 谭平山、苏兆征向武汉国民党中央提出辞职，并发表《辞职书》。

△ 宋庆龄、陈友仁分别离开武汉赴苏联。9月26日同时到达莫斯科。

月底 以共产党员卢德铭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奉中共中央指示，由武汉乘船东下赶往南昌，准备参加起义。

八 月

1日 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集结于南昌市和马回岭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十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之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团，第二十军，第五方面军之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装等部，共二万余人，举行起义。是日凌晨2时，位于南昌市的起义部队突然对守敌发起全面进攻，经激烈战斗，至天明，全歼敌第五方面军警备团、第六军之第五

十三团及第三、第九军各一部共三千余人，缴获各种枪五千余支，占领南昌城。下午，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三个营和第七十四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开往南昌，途经德安将尾追之敌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所率卫队包围缴械，次日到达南昌与主力会合。

△ 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南昌市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定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于右任、陈友仁、何香凝、吴玉章、彭泽民、林祖涵、贺龙、郭沫若、苏兆征、江浩、黄琪翔、恽代英、朱晖日、叶挺、周恩来、张国焘、彭湃、张曙时、李立三、经亨颐、徐特立等二十五人为委员。宋庆龄、邓演达、贺龙、郭沫若、恽代英、张发奎、谭平山七人组成主席团。革命委员会下设农工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宣传委员会（主席恽代英）、财政委员会（主席林祖涵）、秘书厅（秘书长吴玉章）、参谋团（刘伯承、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组成，刘伯承兼任参谋长）、党务委员会（主席张曙时）、政治保卫处（处长李立三）、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会上还通过了《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为革命委员会提出六条政治纲领。

△ 南昌《民国日报》发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林祖涵、吴玉章、于树德、恽代英、恩克巴图、杨匏安、柳亚子、高语罕、谢晋、白云梯、毛泽东、董用威、江浩、韩麟符、夏曦、许苏魂、邓颖超、屈武等二十二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屠杀民众的罪行，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的工具，国民革命的罪人。号召革命同志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与新旧军阀、实行解决土地问

题而奋斗。

△ 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上作题为《论中国》的演说，指出今日中国革命正处在其发展的第二阶段上，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尽量利用党、无产阶级（工会）、农民（农会）和一般革命的公开组织，推动武汉的国民党人向左走，向土地革命的方面走，把武汉的国民党变为反对反革命斗争的中心，变为工农的未来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

2日 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进一步揭露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种种罪行。指斥武汉国民政府如今已变成军阀政府，与革命公敌蒋介石等类毫无差异。同时表示，共产党“拥护真正革命的民权的国民党，反对背叛革命的篡窃国民党旗帜的假国民党”。号召广大国民党群众“决然的完全和背叛革命与党的少数领袖决裂”，继续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事业，努力为解放中国广大的劳动民众而奋斗”。

△ 南昌起义部队进行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所属部队编为三个军。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下辖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兼（部队南下到会昌时改由古勋名任师长）、党代表颜昌颐；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下辖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第九军（只一营左右部队），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方面军共二万余人。

△ 南昌各界数万人在贡院侧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八一起义胜利和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委员宣誓就职。

△ 武汉政府下令“讨伐”南昌起义军，着张发奎督率所部迅速向南昌“进剿”，朱培德率赣东南各处驻军严密兜截，唐生智抽调湘赣驻军合力“围剿”。

3日 中共中央发布《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四省于秋收时节实行武装暴动，夺取乡村政权，并提出六条“暴动的战略”：（一）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力量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政府。“除夺取乡村政权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二）对祠堂庙宇及五十亩田以上的大地主一律抗租不交，对五十亩田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以佃七东三为大致标准。（三）夺取一切政权归农协，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四）对反动政府拒绝交纳任何租捐，实行经济封锁。（五）自耕农土地不没收，但自耕农及已取得土地之佃农应向革命政权交纳田税。（六）农协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分配。此外，大纲还对上述各省近期的主要任务作了原则规定。

△ 南昌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原定南征八粤再行北伐的计划，开始陆续撤离南昌，沿抚河南进。是日，朱德率领的第九军（实际只一营左右兵力）为先遣队和蔡廷锴第十师开始行动。4日，叶挺率领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撤离。5日，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直属部队、贺龙第二十军撤出。6日，周士第第二十五师及警卫队撤离南昌。

△ 唐生智、朱培德、程潜自武汉致电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请其“合力堵截”南昌起义军。

4日 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要“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南昌起义部队，强调“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请粤省委特别注意”。

△ 南昌起义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南下进至进贤时，脱离起义军，旋开赴闽浙边受陈铭枢收抚。

5日 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指出南昌起义的主要目的是发动土地革命，给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暴动以有力帮助。因此，四省也即应给南昌起义以有力的响应，开始秋收暴动，只有把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紧密结合起来，一齐发展，土地革命才

有胜利的希望。为达上述目的，中央要求湖南省委广泛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以鼓动农民开始秋收暴动，同时采取一切破坏手段，牵制唐生智部队对南昌的压迫。

6日 张发奎在九江大捕共产党人，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要领导人共七十余人全部被捕。9日，二十六名共产党员被杀害。

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期一天。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青年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等。会议听取了罗明纳兹关于《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主要内容的报告，和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的中国共产党新任务的报告，讨论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会议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工农运动、土地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方面的错误，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党在现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会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作了发言。毛泽东在发言中着重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最后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九人为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七人为候补委员。这次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使党大进了一步。但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过分强调了进攻，因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

△ 南昌起义部队大部抵达赣西临川。决定在此休整三天，对部队和党的组织进行整理，并以第二十军直属队一千五百余人组成第三师，周逸群任师长，徐特立任党代表。

△ 张发奎部进占南昌，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疯狂捕杀。

8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清查共产党的四项办法：“（一）各党部各行政机关在职人员，一律声明有无跨党，以定去留。（二）著名共产党分子应由军警严密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即拿办。（三）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二日内登报声明，以文字反共。（四）如有共产党分子潜伏各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退出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同时宣布凡共产党员列名国民党执监及候补委员者一律开除党籍并免职。

△ 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发表通电，对武汉政府以前之“容共”表示谅解，并称武汉分共后，“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欢迎双方重要人物赴宁“柄权”。

9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讨论了政治局成员的分工，决定李维汉兼管组织部、秘书厅；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周恩来负责军事部（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杨之华负责妇女部；顾顺章负责交通局；出版局暂由郑超麟办理。会议还讨论了主要的地方组织问题，决定派王荷波、蔡和森组织北方局；派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同时重点讨论了湖南的工作，决定派毛泽东、彭公达到湖南改组原省委，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指定彭公达为省委书记。

△ 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告知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对湖南工作的几项决定。

△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作出《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决议在述及中国革命问题时认为当前中国革命的特征是，工农和城市贫民结成反对一切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同盟。革命转入了自己发展的更高阶段，即直接为建立工人

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斗争的阶段。并断定“在较短时期内，新的革命高涨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中国共产党应当进行坚决的、不间断的斗争，“尽一切努力发展土地运动，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武装工农，以奠定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的基础”。

上旬 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决议，定出秋收起义计划，将全省划分为鄂南、鄂东、武汉、京汉路、鄂北、鄂中、鄂西七个武装起义区。并规定：第一步，建立起各区起义指挥机关，组织秘密武装，恢复农民的组织 and 斗争勇气；第二步，镇压土豪劣绅，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夺取敌人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和工农革命军。起义时间定为9月10日。计划还确定以当时农运基础较好的鄂南区为全省起义的中心，以与湖南秋收起义密切协同。

11日 中共中央致信广东、广西省委和闽南临时委员会，决定以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组成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在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

△ 中共中央致信山东省委和山西、满洲临委，决定以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王荷波任书记，蔡和森为秘书。负责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党部，并指定刘伯庄为顺直省委书记。

12日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分，和湖南省委新书记彭公达，先后离开武汉赴长沙，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准备发动领导秋收起义。

△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一号》，介绍八七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意义。指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倾向”。要求各级党组织接此通告和会议决议案后，务必从速翻印传递到下级党部，给一般党员详细讨论使其切实了解，“并立即遵照这些议决案改正或实行党的组织、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国民党运动之新方针”。

△ 蒋介石在南京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当晚离宁